

# 鲁迅仍然活着

▲ 纪念鲁迅逝世六十周年诞生一一五周年

● 王景山 著



中国和平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62 8195 9

# 鲁迅仍然活着

——纪念鲁迅逝世 60 周年诞生 115 周年

王景山 著



中国和平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迅仍然活着:纪念鲁迅逝世 60 周年诞辰 115 周年/王景山著. —

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6. 7

ISBN 7—80101—587—8

I. 鲁… II. 王… III. 鲁迅-纪念文集 IV. ①1210.97②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9561 号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和平出版社电脑排版**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

北京友谊印刷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16.00 元

## 目 录

论鲁迅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轨迹及其特点·····	( 1 )
爱国赤诚 辩证唯物思想 求索精神·····	(19)
鲁迅的改革思想和开放意识·····	(29)
鲁迅的爱国主义和传统文化·····	(43)
“五四”时期鲁迅人道主义思想初探 ·····	(50)
鲁迅是“民族派”，还是“西洋派”？·····	(59)
鲁迅与比较文学·····	(76)
开展鲁迅研究中的比较文学研究·····	(86)
鲁迅和台湾新文学·····	(92)
释《呐喊》·····	(104)
解《彷徨》·····	(109)
说《故事新编》·····	(114)
议《野草》·····	(118)
谈《朝花夕拾》·····	(124)
《孔乙己》详解·····	(129)
鲁迅杂文中的“忧患意识”·····	(142)
试谈鲁迅杂感的阅读和分析·····	(148)
杂谈鲁迅杂感的几个写作特点·····	(156)
《论雷峰塔的倒掉》详解·····	(170)

## 二

谈谈阿 Q 的“革命”问题 .....	(180)
关于祥林嫂悲剧的思考 .....	(185)
爱姑悲剧以外 .....	(191)
我看《理水》结尾 .....	(195)
“夜游的恶鸟”辨析 .....	(201)
我也谈谈“千夫” .....	(206)
《自嘲》诗本事新解 .....	(210)
“半个秀才”就是半个秀才 .....	(216)
小栓知道自己吃的是人血馒头吗? .....	(219)
六一公公非少年 .....	(221)
范爱农能喊鲁迅“鲁迅”吗? .....	(223)
“革命的前驱者”到底指谁? .....	(226)
《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能没有胡适吗? .....	(230)
国民党“密令”和鲁迅研究 .....	(233)
异议三则 .....	(235)
(一) 毛泽东“设宴”为章士钊“辩冤”? .....	(235)
(二) 有关发现蔡元培佚诗的两个小问题 .....	(236)
(三) 胡适曾要陈西滢放下“绅士的臭架子”吗? .....	(238)
鲁迅的“庸俗社会学”! .....	(240)
论“鲁货” .....	(243)
鲁迅与骂人 .....	(247)

## 三

笑声与泪痕 .....	(250)
“无是非观”惹是非 .....	(253)
人有鬼气，鬼有人气 .....	(257)
“我还是走好!” .....	(260)

墓里墓外两鲁迅·····	(264)
尊重孩子的创造·····	(268)
望子成龙与教子成人·····	(270)
理解孩子, 指导孩子, 解放孩子·····	(272)
“塔是终究要倒的”·····	(274)
呼唤改革的强音·····	(277)
“二丑”和《包围新论》·····	(280)
现代史的又一侧面·····	(282)
绵羊和山羊, 家猪、野猪和豪猪·····	(284)
文官的“武略”·····	(287)
爱不溢美, 恶不贬损·····	(289)
批评家和“天才”·····	(291)
为“讽刺”正名·····	(294)
中国应该有声·····	(297)

#### 四

“木瓜之役”考·····	(300)
“两遇于越”、“经二大涛”事迹考·····	(333)
绍兴府中学堂“剪辫风潮”发生时间考·····	(342)
鲁迅日记和书信中的蔡元培·····	(351)
关于《新青年》问题的若干封信·····	(358)
围绕“焚草之变”的几封通信·····	(379)
《鲁迅地质佚文》缺题试解·····	(383)
附: 鲁迅地质佚文·····	(385)
附录·····	(392)
祝《鲁迅研究动态》·····	(392)
《鲁迅书信考释》后记·····	(394)

《鲁迅名作鉴赏辞典》编后感 .....	(396)
我编《鲁迅名作鉴赏辞典》 .....	(400)
后记 .....	(403)

# 论鲁迅爱国主义 思想的发展轨迹及其特点

---

鲁迅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真诚的爱国主义者的一生。

爱国，是他一切思想、感情、言论、行动的总出发点。因此，他忧国忧民；因此，他要救国救民。

他一生中，不断地在追求、在探索，有坚持、有扬弃，并曾一再产生苦闷、彷徨，甚至时而随便、时而峻急，究其实质，只是他在急切地寻找一条真正能够救国救民的道路，除此而外，他别无所求。

他的《自题小像》一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阖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是他献身的誓言，也是他终生的写照。

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在我国近代、现代史上出现，不是偶然的。

他出生于一八八一年。上溯四十一年，一八四〇年发生了英帝国主义者侵略我国的鸦片战争。结果清王朝败绩，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上溯二十五年，一八五六年发生了英法联军侵略我国的战争，即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果清廷再败，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此后，沙皇俄国于一八五八年、一八六〇年、一八六四年、一八八一年胁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了《中



俄瑛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中俄伊犁条约》，割去我国领土一百五十余万平方公里。

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鲁迅诞生之日，正是我国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急速转化之时。

鲁迅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又发生了一八八四年的中法战争，腐败透顶的清政府在战争获胜的情况下，却仍然签署了丧权辱国的第二个《天津条约》。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清王朝的海军全军覆没，结果签订了《马关条约》。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清王朝的皇帝、太后“西狩”长安，结果又签订了丧权辱国莫此为甚的《辛丑条约》。

根据这些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列强抢去了或“租借”去了中国的大片领土，索去了大量的赔款，取得了种种特权，并强行把全中国划分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大好河山被瓜分豆剖、蚕食鲸吞的危险，日益加剧。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当时血气方刚的青少年，面临、目睹如此严峻的现实而漠然无动于衷者，是不多的。

中国向何处去？自己应怎么办？这是摆在当时许多正直青年面前的严肃课题。生长在“报仇雪耻之乡”浙东绍兴的少年鲁迅，对此不会不作深沉的思考。

鲁迅最早考虑到的救国之道，应是如何才能富国强兵的问题。

鲁迅于一九〇七年写成的《文化偏至论》等文中，曾态度鲜明地批评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前后出现的所谓“洋务运动”。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少年时期的鲁迅全未受过“洋务运动”的任何影响。因为，“富国强兵”不仅是当时洋务派官僚的口号，同时也是当时一些仁人志士以及相当一部分人民群众的真诚希望。鲁迅十八岁

时，“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sup>①</sup>，而终于怀揣八元川资，只身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数月后又改进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并自号“戎马书生”。这一切，除其他原因外，要学新知识，求真本领，以期富国强兵，应是最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在民穷财尽、国将不国的情况下，爱国少年作如是想，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点也不奇怪的。

然而，一九〇二年他毕业时，却完全失望了。他日后忆述：“爬了几次桅，不消说不配做半个水兵；听了几年讲，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铜铁锡来么？实在连自己也茫无把握，没有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的那么容易。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能，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sup>②</sup>

鲁迅遂于一九〇二年二月东渡赴日。

到日本去做什么？去寻求“维新”之路。

须知，鲁迅在南京求学期间，伴随着对洋务派“富国强兵”论的逐步否定，他还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戊戌变法”的破产，和一次震动全国的义和团起义的失败。青年鲁迅看到，来自上面的改良和来自下面的“造反”，都未能解决中国当时面临的问题，挽救中国的危亡。义和团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没有正确的领导，这对当时还是青年的鲁迅来说，自然还是不可能理解的。但“百日维新”的天折，却促使鲁迅面向日本。因为同是学习西方，日本的“明治维新”却是成功了。“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sup>③</sup>鲁迅就是当时这类中国人中间的一个。鲁迅到日本去，是他“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这一思想的继续和发展。其目的，自然仍是为了挽救中华，振兴中华。

鲁迅抵东后，先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两年，然后考入仙台医

学专门学校。

鲁迅是先决定学医才去日本，还是到日本后才决定学医，以及他决心学医的动机和目的，许多论者的看法和鲁迅自己的说法本身，都颇有并不一致之处。但不管是“日本维新发端于西方医学”说也好，“救治病人疾苦，战时便当军医”说也好，“寻求充足方法”说也好，却都是从意图救国救民出发，应是毫无疑问的。

不过，一九〇六年春，鲁迅习医尚不足两年，却又中止了学医。一九〇四年开始的日俄战争，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交战，却以我国东北地区作战场。而留日学生鲁迅在幻灯片上看到的赫然是：中国人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枪毙。围观的则又是一群中国人。日本一些学生看到此处鼓掌欢呼万岁，捧读《黑奴吁天录》“曼思故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益感喟”<sup>④</sup>的爱国青年鲁迅，对此自然无法忍受。“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sup>⑤</sup>

鲁迅弃医从文，是为了运用文艺改变国民精神。

鲁迅外忧列强之侵略，内忧国民之愚弱，匪自此时始。早在一九〇三年所著《中国地质略论》中，他一方面用最深情的语言赞美：“吾广漠美丽最可爱之中国兮！而实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也”，用最明确的语言声称：“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检；可容外国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覬觐者也”，用最尖锐的语言提醒：“强种鳞鳞，蔓我四周，伸手如箕，垂涎如雨”，“入吾内地，狼顾而鹰睨”，“足迹所至，要索随之”。一方面却也用最沉痛的语言指出：“况吾中国，亦为孤儿，人得而扞楚鱼肉之；而此孤儿，复昏昧乏识，不知其家之田宅货匪，凡得

几许。盗据其室，持以赠盗，为主人者，漠不加察，得残羹冷炙，辄大感叹曰：‘若衣食我，若衣食我。’而独于兄弟行，则争锱铢，较毫末，刀杖寻仇，以自相杀。”鲁迅认为，“现象如此，虽弱水四环，锁户孤立”，也会“以日退化，为猿鸟蜃藻，以至非生物”的。尽管鲁迅在这里是用生物进化论理论来解释社会问题，但仍可清楚看到，他的爱国、爱民和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

据鲁迅挚友许寿裳后来回忆，弘文学院学习期间，鲁迅和他每每谈及中国民族性的缺点，常常议论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后之论者，常以此事为鲁迅病，殊不知这正是鲁迅思想的深刻处。他们是试图从根本上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和方法。改造国民性问题此后长期为鲁迅所关注，决非偶然。

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九年，鲁迅在日本东京从事文艺工作。他先后撰写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重要论文，宣传了“科学救国”思想，倡导了“个性解放”思想，强调了应在精神界进行战斗的思想。其目的则是针对国民的“昏昧无识”，启发国民的自觉，从而求得社会的改革，国族的复兴。

鲁迅重视科学，毫不奇怪。他先学海军，继学开矿，复习医术，与此同时又接触和接受了进化论，涉及的都是自然科学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他站在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立场上，尖锐批判了西方科学发展史上的力图阻止生物进化学说发展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以及当时中国的“抱残守阙之辈”和“死抱国粹之士”。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强调了科学和改革社会的关系。他指出：“盖科学者，以其知识，历探自然见象之深微，久而得效，改革遂及于社会。”“洪波浩然，精神亦以振，国民风气，因而一新。”<sup>⑧</sup>这样，鲁迅就把“科学与爱国”紧密联在了一起。

倡“个性解放”之说，也不是偶然的。他在上述诸文中一再

强调了“掙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非物质”、“重个人”，“尊个性而张精神”的主张，这固然有受到易卜生以至尼采思想影响的一面，但在事实已否定了“富国强兵”、“变法维新”、“健身强种”等诸道路诸方法后，则“个性解放”主张勿宁说是理论上必然会引出的结论。他声言：“今敢问号称志士者曰，将以富有为文明欤，则犹太遗黎，性长居积，欧人之善贾者，莫与比伦，然其民之遭遇何如矣？将以路矿为文明欤，则五十年来非、澳二洲，莫不兴铁路矿事，顾此二洲土著之文化何如矣？将以众治为文明欤，则西班牙、波陀牙二国，立宪且久，顾其国之情状又何如矣？若曰唯物质为文化之基也，则列基括，陈粮食，遂足以雄长天下欤？曰唯多数得是非之正也，则以一人与众禺处，其亦将木居而芋食欤？”<sup>⑥</sup>鲁迅此五问，自然很有些偏颇之处，但其中包括了对自己过去某些看法的否定，是不言而喻的。

鲁迅主张个性解放，反对“杀之以物质而囿之以多数”，也还是为了爱国和救国。所谓“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鲁迅当时的看法很明确：“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sup>⑦</sup>“张精神”、“张灵明”的主要途径和武器是什么？鲁迅当时认为，是文艺。这种看法集中表现在论文《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在宣传科学时，本来已经指出科学和文艺不可偏废，“盖使举世唯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故人群所当希冀要求者，不唯奈端已也，亦希诗人如狄斯丕尔（Shakespeare）；不唯波尔，亦希画师如洛菲罗（Raphaelo）；既有康德，亦必有乐人如培得河芬（Beethoven）；既有达尔文，亦必有文人如嘉来勒（Carlyle）。凡此者，皆所以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者也。”<sup>⑧</sup>在《摩罗诗力

说》中，鲁迅进一步强调了文艺在唤醒人民、启发人民觉悟方面的重大作用。

“平和为物，不见于人间”。而“不争之民，其遭遇战事，常较好争之民多，而畏死之民，其苓落殇亡，亦视强项敢死之民众。”<sup>⑨</sup>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鲁迅从进化论观点出发，对当时中国及中国人的处境，是有大恐惧的。他在《摩罗诗力说》中不吝笔墨热情介绍“摩罗诗人”拜伦、雪莱，介绍“国民诗人”普希金，介绍“报复诗人”密茨凯维支、介绍“爱国诗人”裴多菲，正是因为“上述诸人，其为品性言行思维，虽以种族有殊，外缘多别，因现种种状，而实统于一宗：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鲁迅是多么希望这类“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在古老的中国出现啊！

事实证明，鲁迅就是这样的“精神界之战士”！鲁迅留东期间，日本是当时中国反清革命党人的重要活动据点。鲁迅和一些革命党人来往密切，支持革命派，反对改良派，并参加了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但他筹办《新生》杂志，编译《域外小说集》，撰写《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文，却说明他的主要力量是放在文艺活动方面的。

以“五四”运动为标志，开始了鲁迅爱国主义的新阶段。如果说前此鲁迅的爱国主义，立足于反帝，那么这一阶段的鲁迅的爱国主义则是立足于反封建。虽然他仍然主张个性解放，但已不是一般地宣传个性解放的重要性，强调个性解放的迫切性，而是明确地把思想革命作为当务之急。

鲁迅于一九〇九年从日本回国，以急切而兴奋的心情迎接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发生，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但辛亥革命的结果，却未能使古老的中国面目一新。爱国主义者的鲁迅自然深感失望。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他焦急、痛苦、彷徨。中

国向何处去？自己应怎么办？他陷入深思。只是到了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才使他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知道了“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重新获得了信心。正如他自己所说：“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sup>①</sup>“历观国内无一佳象，而仆则思想颇变迁，毫不悲观。”<sup>②</sup>

于是他发出了战斗的呐喊，而这“呐喊”的第一声——《狂人日记》，便是一个伟大的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在一个新时期开始时发出的强音。

关于《狂人日记》的诞生，鲁迅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日致许寿裳信中有一段极为重要的说明。他说：“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可以认为，鲁迅“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sup>③</sup>的思想，在《狂人日记》中有着集中而鲜明的表现。长期存在而且广泛存在的吃人现象和吃人思想，鲁迅当时肯定认为是最严重的“病苦”，如不改变，民族无望。“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吃人思想从何而来？来自封建道德，封建礼教。“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吃人思想如何消除？批判封建道德、封建礼教，于是鲁迅高举“思想革命”的大旗，对形形色色的“旧道德”、“旧思想”、“旧学说”、“旧见解”、“旧习惯”、“旧本领”、“旧方法”、“旧手段”，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和抨击，呼啸前进，所向披靡。

十几年后，鲁迅在《草鞋脚（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小引》中回顾道：“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们以为只要

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来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鲁迅这里所希冀的“好的社会”，其实就是他早先所谓的“人国”。不过，“人性的解放”，问题虽然依旧，而以扫荡旧的成法为中心的思想革命，却构成了鲁迅“五四”时期爱国主义的新的战斗内容。

有必要再谈一谈“揭出病苦”的问题。鲁迅所谓“揭出病苦”，实际上主要是揭示和批判群众身上的缺点和弱点。在鲁迅作品中，特别是在他前期的杂文、小说中，揭示和批判国民性弱点的地方，比比皆是。这种现象曾引起许多论者、研究家的注意。为鲁迅讳者，力言鲁迅笔下的国民性种种弱点应是反动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身上的东西，至少是非为劳动人民所固有。反对为鲁迅讳者，则认为这是由鲁迅前期世界观的局限所造成，他未能看到劳动人民身上的本质的东西。议论纷纭，莫衷一是。

其实，鲁迅从来不是民族自卑或民族悲观主义者。在一九〇三年所著《中国地质略论》中，他对我中华民族作了热情洋溢的赞美。在一九〇四年十月八日致蒋抑卮信中，他自豪地声称：“近数日间，深入彼学生社会间，略一相度，敢决言其思想行为决不居我震旦青年上，唯社交活泼，则彼辈为长。以乐观的思之，黄帝之灵或当不馁欤。”一九二〇年写的《一件小事》，歌颂了一个人力车夫的高尚品质。这些都是最好的例证。

而且，在鲁迅笔下，吃人思想绝非赵贵翁所独具，而阿Q的精神胜利法更非主要表现在赵、钱太爷身上。这并不奇怪。因为，“揭出病苦”，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如果吃人思想、精神胜利法等等，只存在于剥削阶级、反动派身上，何须大惊小怪，“疗救”云云，又从何谈起。看到这些可怕思想和劣根性，在相当一部分群众身上也严重存在，妨碍着他们的觉悟和斗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因而实事求是地忍痛予以指出，这才是鲁迅思想的深刻处和人格的伟大处。

主张“睁眼看”，反对“瞒和骗”，这里正显示了清醒的现实



主义者鲁迅的清醒的爱国主义特点。

清末以来，某些自命爱国的人常以复古、保粹、排外为己任，似乎复古、保粹、排外就是爱国的同义语，认为爱国必复古，爱国必保粹，爱国必排外。五四前后，此种论调更加甚嚣尘上。鲁迅却完全不是这样的。早在《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等文中，鲁迅就讽刺过“耳新声而疾走”的“中国抱残守阙之辈”，批评了自欺欺人的“震旦死抱国粹之士”。五四运动前后，他更尖锐地抨击了“复古”、“保粹”思想，特别强调了向外国学习的重要性，主张屈尊去学习“洋鬼子”，声言“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pollo。”<sup>⑧</sup>当复古、保粹之风弥漫全国的时候，他甚至大声疾呼：“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sup>⑨</sup>他赞赏汉、唐的“豁达阔大之风”，深刻指出：“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sup>⑩</sup>

鲁迅爱国主义这种进取而非保守的特点和他后来在《拿来主义》一文中所说的“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的看法，是完全一致而且一贯的。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和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是鲁迅前期经历的两次爱国运动高潮。但这两次高潮中间，鲁迅思想上却经历了又一个苦闷、彷徨的阶段。十几年后有题小说集《彷徨》诗云：“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载独彷徨。”这正是当时鲁迅心情的真实写照。“一卒”“彷徨”的心情从何而来？只因“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